中国工业成就的文学印记

——第二届中国工业文学大赛长篇小说读记

□徐粤春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阶梯。中国工业文学担当中国工业的精神传达和形象反映，它犹如深入到中国现代化的心脏和引擎，可触摸它的搏起和脉动，透视燃烧室输出澎湃动力。长篇工业小说以宽阔的体量和丰富的形式，全景式反映当代工业生产生活的厚重与精细，是认知中国发展历程，探寻中国成功答案的最佳文学形态，为读者提供了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样式和审美体验。第二届中国工业文学大赛集结了82部长篇工业小说，其中75部通过初审，24部进入专家评审，这些小说集中反映了中国当代长篇工业小说的总体状况。

卓然而立的中国工业形象。反映新中国70年工业诞生发展史是普遍题材。《黑脸》《野百合》《历程》《江东创业史》等小说，讲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煤炭、石油、造船等企业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故事。《黑脸》中的采煤能手“大斧子”，每次下井都全力以赴，尽可能为国家多采煤，每一次不拿第一绝不罢休。遇到矿难时，他沉着冷静，排险解困，越危险越往前冲，置生死于度外。“大斧子”有极强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领导才能，无论多么调皮捣蛋的人，进入他的班组，都能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调教成胜任岗位的好手。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生动地树立起“大斧子”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他精湛的工匠技艺、忘我的劳动热情，集中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精神风貌和优秀品质。

《瓜熟蒂落》《风过太阳城》《开锁》《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等小说，以国企改革、民企发展为背景，讲述了新时期改革开放敢闯敢试、新时代“制造强国”创新创造的故事。《瓜熟蒂落》讲述打工仔季天翔，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拼搏进取，忍受委屈，战胜困难，不断丰富、提升自我获得成长进步，最后从一个小保安，历经电焊工、小包工头，成为一个民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发展史。季天翔个人的成功，反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成功，折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瓜熟蒂落》塑造了中国民营经济充满活力、拼搏奋进的中国工业形象；《风过太阳城》以国企副厂长袁立德为首的正面人物和以厂长查伟进为代表的反面人物对立冲突来展开故事。小说设置电厂走出国门、转岗分流、热电联产等重大事件，把事业线索、反腐线索、人物关系线索、角色感情线索、人格发展线索融合叙述，互相支撑互相促进，使得形象塑造丰富立体饱满，人物真实可信感人，现代国企的形象和现代国企领导人的形象跃然纸面。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存在重叙事轻刻画，人物面目模糊，缺乏性格的通病。他们的主人公多少有些“高大全”的模式化好人印象——为人正直、有技术专长、群众基础好，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内在性格的个性不足，难以留下深刻印象。

主题性叙事的生活切口。主题先行、宏大叙事似乎是所有工业长篇小说的先天弊病。在这样的创作定式下，小说的思想性首要被强调，成为前置条件，艺术性则在其次，即使差强人意也可接受。一副上来就要说教的面孔，令人敬而远之。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大赛的许多作品没有落入既往窠臼。

一种是故事情节牵引带动叙事。小说《开锁》以如何打开防盗锁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悬念置顶、环环相扣，围绕这一线索，人物出现或消失，情节高潮或低徊，在开锁业与制锁业的博弈，盗贼与警察的较量，以及由此折射的人间正道与世道人心中，映照了民营企业的活力缘由和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改革的必然；另一种是个人创业发展叙事。小说《世界工厂》打工仔林伟强、《草根的实业梦》大学生秦奋的故事都发生在珠三角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他们从一开始在底层打工，但雄心壮志从未磨灭，葆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奋斗，不断学习，碰到一个又一个困难，遭遇一起又一起挫折，家业不断累积，头脑愈加丰富，完成了从流浪汉到业务员再到小老板的创业历程。林伟强、秦奋的创业故事反映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追梦筑梦圆梦的真实故事，成为中国工业化宏大叙事的个体注脚。

一些以企业改革发展为主题的叙事，没有直接描写企业生产经营具体运作，而是重视从人物的生活出发，通过对个体生命际遇、群体前途命运的描写，自然关联企业、行业发展的故事。写人，就是写企业，写生活就是写生产。《流年渡》《仰望长空》《你看长江往南流》《野百合》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大众阅读与小众阅读。中国的小说脱胎于唐传奇、宋话本，至明清小说达到高峰，实际是当时说书人在市井勾栏瓦肆说书的脚本。西方小说萌芽自中世纪英雄史诗、骑士故事和民间故事。小说的渊源说明，大众阅读一直是小说的固有属性。随着社会变迁，审美风向演进，小说阅读出现了精致化、圈子化和网络化、快餐化两种倾向。后者代表的是网络文学，其实际是小说的大众阅读的延续。前者在形式上保持印刷样式，小说这种文体进入了高雅艺术的行列，呈现小众阅读的倾向。

本次参赛作品也呈现出这两种分化态势。《野百合》《流年渡》《大峪口》《红房子》《后浪惊拍》等明显带有专业写作特点，这些作品以短篇的方式写长篇，语言雕琢考究、意象藉蕴丰厚，不仅有整体，还有细节。《流年渡》这么交代故事的石油工业背景：“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始终认为，自己生存的特定的环境里，生命在子宫里孕育时，就被熏陶感染了。在他单纯的意识里，周围的一切都是红色的，就连生活的草原，也有个激昂的名字——红色草原。”精致的阅读可以带来深沉的美感，但对于长篇小说而言，也会带来节奏的卡顿，影响阅读的流畅，这么读几十万字的作品，着实让人视为畏途。

《开锁》《非常商道》《中国造》《世界工厂》《草根的实业梦》则是另一种阅读体验，文字直白、表达简浅、节奏轻快，易于产生阅读快感。从文体上看，有些还传习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特点。《非常商道》全篇16章，每章若干节不等，每章内容相对形成一个独立板块，各章节相互勾连，形成一个叙事逻辑整体。读者阅读过程如同在长途高速路行车，累了在服务站歇歇脚。《世界工厂》《草根的实业梦》则是对自然主义风格的体现。《世界工厂》以“我”的打工经历为线索，刻画了现代技术工人，依靠“不解决问题不罢休”的工匠精神，为工厂解决了一道道技术难题，改善了产品品质，提高了生产效率，揭示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的细节原因，小说平铺直叙，结构简单，话语直白，基本是对生活细节的再现。这些作品尽管不失阅读快感，但其思想承载与艺术内涵略有不足，其审美高度有限。

文学地图样貌初现。东北地区的《黑脸》，语言滑稽逗乐，善用俗语白话，像曲艺里的脚本。如：大斧子这一生同大字结缘，名字里有大字，叫大福，绰号有大字，叫大斧子，长相里大字更多，大脸盘，大眼眶子，大眼仁，大鼻头，大耳垂，大脑门，大手，大脚，大身板，说话大嗓门，脚穿大号鞋，走路迈大步，酒量大，饭量大，力气大……这段描述如同“贯口”一般，读起来酣畅淋漓，人物的形象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描写茬子与玫瑰花在公交车上第一次见面时的心理对话：“这个男人有点小幽默。”“我怎么一点都不会幽默呢？”“这个小伙子是矿里的吧？”“这个女孩是医院的护士吧？”“这个小子长的够难看的。”“这个女孩长得够漂亮的。”“小伙子长成这样，太寒碜了，找对象谁跟呢！”“我要是找一个这个长相的女孩多好啊。”“就这小伙子恶劣的长相，给多少钱都不能跟呢！”“多搭点钱也得照这样的女人找啊。”像二人转表演，把两人的思想差异表露无遗，开启了后面戏剧性变化的情感故事。

《开锁》则是天津风味的作品。天津人平时说话就很诙谐、幽默、逗笑，天津的小说风格自然是妙语连珠。津味小说的特点是生活气息浓郁，采用大量的方言俚语俏皮话，腔调独特，蕴含着民众的生活智慧，机智幽默。天津工业题材小说在全国走在前面，《开锁》把工业小说传统的拓展与津味小说的特色融入一体。在牛奔与乔杉杉去马尔代夫旅游时，为了让乔杉杉穿三点式泳衣，牛奔揶揄道：“老实说，我老婆的体型比你好，皮肤也比你的白净，所以你不要害怕我会被你吸引。相反，你别被我男子汉的肌肉吸引就不错了。”乔杉杉被激将法制住，乖乖地去换了泳装。这样的话语表达把天津人“卫嘴子”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

两湖地区的文学带有楚地巫风的气息。《中国造》里的具有特异功能的三姐妹，《非常商道》里岳飞后人肇始淘金技艺的传说，《红房子》里鸡公山上藏宝的传说等等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设置，使得以现实主义为主轴的工业小说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通过这些文学手法依稀可以看到上古以来两湖地区烂漫、奔放、玄奥的美学风尚。

《野百合》《仰望长空》文本内敛细腻、深沉厚重、想象丰盈、品咂有味，延续了西北文学的风格特点，也可以看做乡土文学神韵移植到工业文学的成功样本。如《野百合》钻井“卡钻”事故发生后，有人说风凉话：“熟死的荞面生着呢，精死的女人憨着呢。别看个个表面精精灵灵的，一旦出了故障，个个都瓷了”……这些反映生活智慧的民间谚语，在文本上广为使用，反映了西北地区文明滥觞之特点。《仰望长空》中女主人公阴差阳错错配郎君，却囿于当时的情势不得不接受，作者用大段细腻到位的心理描写，使得故事情节真实可信，树立起坚忍负重的西北女人形象，成为小说成功的重要基石。

《世界工厂》《草根的实业梦》基本没有环境的渲染和烘托，也缺乏人物内心的描写与观照，记叙为主，描写为辅。语言平实直白，感情波澜不惊，情怀深埋心底，表明了一种追求个人发达奋斗不息的生活态度，体现了广东“打工文学”的特点。

在鲁迅与我们的眼光之间

——关于张暄的散文集《母亲的市民之路》

□李蔚超

溽热褪去，凉浸浸的。秋后多事，扰得我心神不宁。

“小人物的逻辑和套路，你永远摸不清。”微信上，张暄发来一句。

“作为警察，我提醒你。”又补充。

这等话搁在那儿，不由得人不静心琢磨。山西作家张暄是一名警察。但我得识张暄，却是在一次山西的小说年会上。一眼望去，无需多言，他的神情里明晃晃闪烁着深长的意味——我是有故事的人，且待下回分解。

张暄是一位富有文艺气质的人民警察，一手转发着文青腔调的世界文艺资讯，一边欲盖弥彰泄露出置身社会新闻现场的参与感。作家与学者们谈论张暄的小说，大抵不脱几个范围——有生活，识人心，讲故事。结论出自前提，张暄是一名警察，尽人皆知。他的职业，在旁人看来，意味着独享一笔丰沃的生活经验，如武侠小说里的豪客，涉险江湖，自有智珠在握的资本。这本集子里的《防盗门》便是一例，写的本是家庭琐事，不外是农村来的父母与城市儿女之间生活习惯不同而引发的人生感慨，但是，张暄身怀秘笈，门的故事平添了几分“江湖”气。卸锁的小伙子不信“我”警察的身份，“我”则立刻“亮剑”，互叙行话，提起一位前几年干刑警时抓捕的嫌犯，此犯显见与开锁界有几分半晦半明的瓜葛，由不得开锁小伙子不信。门的故事因此获得了余韵悠然的生命力，不仅事关门内的一地鸡毛，也向门外普通读者未知的世界敞开。

一个验证文学价值的办法是，当你读罢一本书，作品中是否拥有某个细节、瞬间、人物，在未经召唤时浮现在你的脑海里。绅士派头十足的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激赏不已，他称契诃夫为“严肃的观察者”，契诃夫貌似注意到了人物内心所有可能的细节。伍德说，契诃夫深知我们在自己的脑海里讲述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是内心的扩张主义者，是滑稽的幻想家。也就是说，事实只是客观的表象，而事实在人的脑海中延宕出的感知、联想和样态，才是更重要的。文学的细节不仅仅是生活的片段，它们代表了那种神奇的融合，也就是文学技巧产生出最大数量的非文学或真实生活的拟象，在这个过程中，技巧自然被转换成虚构的、全新的生活。在严肃的观察者的精妙论述后，伍德一如既往地展开了诗意抒情：“观察是拯救，是救赎，是把生命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

读张暄的整本集子，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伍德关于细节的精妙言论。写小说时，张暄偶尔动用他的警察秘笈，并屡收奇效。事实上，在中国，自有一脉已成体系的公安文学，迥异于欧洲、港台或好莱坞的侦探小说、警匪双雄及罪案影视，有着承袭中国特色的善恶评判和故事模式，一旦此类公安文学的文学性虚弱不堪，很容易暴露出一幕幕中国社会现实的怪现状，坦率地说，我读此类作品不乏猎奇心。当我看到张暄这本散文集以《母亲的市民之路》为题时，曾提出质疑，何不叫《警事随笔》？更吸睛吧。张暄答得老实，这篇《母亲的市民之路》得过奖，与阿来这等大家分享殊荣，编辑认可。其实，作家的心思曲折隐晦，不识趣的人非要追问，只好云山雾罩地支应着。写散文时，张暄似乎有意反其身在“江湖”之道而行，他宁可写身边的人与事，老父老母，邻里乡亲，同学老师，这些人与事看似是作家最熟悉的部分，信笔拈来情真意切，便利，容易。然而，比起警察故事，平易生活最难转化为高超的文学作品。

读过张暄的这本散文，许多细节在脑中缠绕蔓延。张暄大多以温煦平和的态度讲述世俗人生的故事，呈现平常人的心境，他深谙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语浅情深，乐景悲情，七分留白，越是令人侧目心惊的苦，越用平静的心去看待，用冷静老成的语言叙述。他最拿手的文学技巧是准确，不肥不瘦地描写，不过不亏的抒情，有时他的准确显得冷酷无情，如同伍德标榜的好作家一样，张暄是生活的严肃观察者。惟有严肃的观察，才能救赎他和他生命中的人。

你会发现，集子里，张暄勇气可嘉地挑选一类独特的人物检视他们的人生，疯子和傻子。张暄回到乡村，回忆往事，他要记录他生命中见证过的特殊生命，“我明白疯和傻确是不一样的。傻是缓缓流淌的河流，疯则是翻江倒海，其中蕴含了惊人的力量。”纵览某个人物的一生，在真实生活中，类似机会不可多得，而文学常常不怕冒失孟浪，作家视检视人物的命运为职责。疯子与傻子一生中惟一能唤起旁人柔软的同情和怜惜的喟叹，便是死亡的来临，而张暄愿意冷静准确地检视疯与傻的“历史过程”。

散文不同于小说。小说是关于故事的故事，俄式套娃，读者和小说家都知道，小说一贯故弄玄虚以假乱真，叙述人与小说人物里应外合，真真假假，一团迷障。散文的叙述人不能虚，散文读的是作者的见地和生活广度。张暄散文的叙述语调让我印象深刻。很多时候，他似乎甘做一个和事佬，不偏不倚。仔细想想，正如时间视生命为平等，法律的前提是置人的尊严于平等，然而，这平等绝非天随人愿，势必是社会共识之下底线意义上的平等。作为警察的张暄，在我看来，他的职业之与他作家的身份而言，更内在的影响也许就在于“底线”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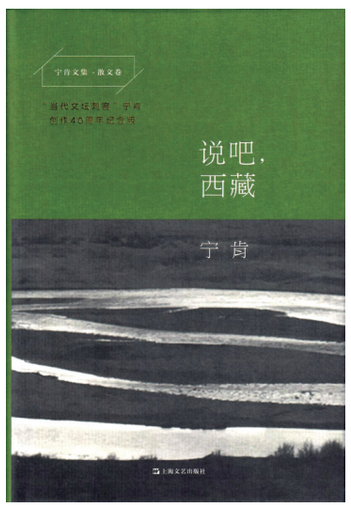
作为散文的叙述人张暄不是什么异己，张暄是“我们”。他反复确证着主流社会的价值准绳和道德标尺，他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各色人物，特别是世道时俗呼为“小人物”之流，“不合时宜”之辈。张暄谨慎克制地描写了不得志、情商低、惹人烦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呼应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一广泛通行的社会共识。同学沈宽阔，临时工陈钟，整部集子里我最喜爱，或者说最触动我的，是张暄写下的可怜人的故事。

张暄越是冷静，越是准确，越是克制，我们于心安理得的共识状态下越是生出疑心，可怜之人究竟是如何沦落为可怜的境地？疯既然分为先天的疯与后天的疯，这疯、可怜、不合时宜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不得不想起鲁迅。读张暄的可怜人，使我不得不想起祥林嫂、孔乙己、阿Q，想起鲁迅看向他们的眼光。中国文学顺鲁迅而下，开启了“眼光向下”的革命。文学的基因给予了每一位优秀中国作家一双鲁迅式的眼睛，每个人都不得不透过他的眼睛看取他曾经看过的可怜人，张暄也不例外。张暄的眼光也是我们的眼光，他暴露的便是我们共同的隐秘。然而，对于那些社会共识，张暄不像是真的信，他将信将疑，他信也不说，他的眼光在鲁迅与我们之间摇摆迟疑。在迟疑与摇摆之间，光滑的共识上裂出了一道缝隙。这是读张暄给予我最大的启迪。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说吧，西藏》，宁肯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



全套8册的“‘当代文坛刺客’宁肯创作40周年纪念版”《宁肯文集》，包括两本散文集，《说吧，西藏》是其中之一。与另一本散文集《我的二十世纪》相比，《说吧，西藏》恰如其名，所收各文都跟西藏有关。可能宁肯迄今为止所有西藏题材的非虚构类作品，都汇聚在这里了。书中选文分成四辑，第一辑7篇、第二辑11篇，均为独立成题的单篇散文，第三辑是总题为“西藏日记”的日记选，第四辑是8篇自述或对话体的创作谈，合起来二三十篇、近25万字。在时下常见的个人散文集里，这属于分量和内容都比较精粹的选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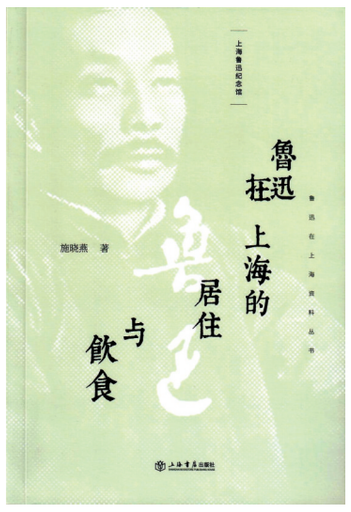
恰如作者在书中一篇自述《重现的时间》里所流露的那样，对于西藏，他感受过的，比他已经写出来的更多。但另一方面，作者也同时意识到：“我觉得作品最高的境界不是讲述，而是重现。是《墙上的斑点》，是《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个人在井中观天，看到重现的时间。”有品质的写作，并不需要也不应该以向读者兜售尽可能多的货色为目的。这里真正的关键，不在于作者想要展示给读者什么，以及如何展示或展示多少，而在于作者是否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启动某种题材创作过程的最佳时机。

从这个意义上讲，被宁肯本人认定为他后来在散文写作方面很难超越的《天湖》《藏歌》，就可称为正当其时之作。不过，以读者的角度来看，1987年问世的《天湖》和《藏歌》更像是一段振拔避俗、努力别开生面的创作新路的开端，而把这条新路向前和向更深广处大大推进了一步的标志之作，则应以首次发表于1998年的《沉默的彼岸》最为醒目。不知是恢复了初稿原状，还是做了新的修整润色，收在《说吧，西藏》这本集子里的《沉默的彼岸》，个别句段和几个小节的标题以及顺序，都与21年前初刊于《大家》杂志“新散文”栏目时的面貌有些不同。这样的细节变化，使得《沉默的彼岸》和《说吧，西藏》整本书，都平添了一层流金岁月、历久弥新的色泽。

在宁肯之前，在《说吧，西藏》之外，包括散文体裁在内，西藏题材的汉语文学书写已呈常态，力作、佳作也屡有所现。但就如同史铁生从《我与地坛》开始的散文创作，彻底突破了无数作者、无数文本观察和记叙、描摹历史名胜或家园故宅的方法一样，宁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末所作的散文创作探索，也从根本上更新和丰富了西藏题材在汉语散文中的存在形态。在流于表面的纪游采风和貌似专深的风土记或人文志式的写作路数之外，一位诚恳谦和、坦率质朴的内地平民文人，以外来者的身份在西藏最普通的民众之中踏实生活，并且从这种生活中重新认识自我与他者、人世与自然的情境体验，被宁肯稳稳地转移进散文世界，获得了可以传之久远的鲜活形式。

其实，《说吧，西藏》所见证的，又何止是关乎某时某地某人的某种生活经历和某一体裁样式的创作探索？如果把宁肯发表散文《沉默的彼岸》之后紧接着完成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蒙面之城》，和《说吧，西藏》里的散文联系起来看，想必每一位试图将人与地、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写深、写细、写活的作者，无论正属意的创作体裁是散文还是小说，抑或各体兼顾，都同样会得到很多切实的启益。

《鲁迅在上海的居住与饮食》，施晓燕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鲁迅一生中在国内外居住过的地方，细数起来，在同代文人里算多的。其中，住得时间较久的，有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九地。对鲁迅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情形，早有许多人做了细致的研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因为鲁迅是文化伟人，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地方本身也是自有其独特传统和现实影响力的文化名城。人与城彼此辉映，相得益彰。详究人与城的关联，也就等于在探察人与城各自的生命图谱。

这本《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编撰的“鲁迅自上海资料丛书”之一。作者施晓燕，是复旦大学近现代史专业出身的青年鲁迅研究专家。按照她在后记中所述，这本书是从她着手对“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人情往来、求医问药、时令活动等各方面都涵盖在内）进行全盘的资料梳理和研究工作中，先行选取出来集结成文的一个部分。与寻常资料性图书直接罗列原始文献的形式不同，《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采用了贯通自足的叙述体例。由此，散见于各处的有关鲁迅在沪居住、饮食的种种片言只语的信息和零头碎脑的物证，都点点滴滴地衔接、糅合起来，归整成了印证和补充鲁迅上海生活整体脉络的一个个清晰生动的场景或画面。

书前设“楔子”一篇，交代鲁迅1927年10月自粤抵沪之初，下榻共和旅馆，为是否定居上海而斟酌筹划的情形。书后有简短“余论”，对鲁迅在上海时期饮食起居状况苦乐交加、况味杂陈的一面，做了要言不烦的评述和揭示。正文7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3章，总题为“上海居，大不易”。依序展开的3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把鲁迅1927年10月至1936年10月9年间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带，先后辗转三个地点、搬家四次、租住四处寓所的前因后果、具体经过和所居房屋的结构、设施及周边条件，都条分缕析介绍得明明白白。下编总题为“吃在上海”，以“鲁迅的做东”“各大菜系中的宴请及交游”“鲁迅的家庭食品及其零食嗜好”“鲁迅家用菜谱疑云”四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刻画、展现了居家饮食和社交宴请中的鲁迅习惯和鲁迅风采。

通读之下，从《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一书能够获得的，不光是关于鲁迅和上海的一些专业知识，更有好多满含世俗烟火气的日常生活经验。而在平实洗练的叙述中，铺排、阐释得让人一目了然的史料实证，更使读这本书的过程变得轻松畅快了不少。